

# 梁启超传

李喜所 元青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梁启超传

(修订本)

李喜所 元青 著

ISBN 7-309-04111-9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传/李喜所 元 青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01-008489-3

I. 梁… II. ①李…②元… III. 梁启超(1873~1929)—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500 号

## 梁 启 超 传

LIANG QI CHAO ZHUAN

(修 订 本)

李喜所 元 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8.25

字数:53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489-3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增订本自序

——梁启超的文化性格

首先感谢乔还田先生的美意，决定修订重版本书。从20世纪80年代初乔先生和我及元青商讨写作本书，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期间，不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追求都潜移默化，和20年前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即使在学界，学者的学术理念、学术思维、学术判断、学术追求，甚至学术语言也不是20年前那样了。社会在变，人在变，积淀久之，社会和人的性格也会异化重组，形成新的文化品格。这就叫环境比人强。生活于和平改革年代的人们尚且要被环境所同化，改变固有的价值系统，梁启超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那种社会文化大裂变的时期，就更会迫使他的文化追求溢出传统，面向中国和世界，重新组合。在重新修订本书的时候，凝思现实，回观梁启超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大致梳理和提炼出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熏陶下所堆积、升华的文化性格。

俗话说，人的性格是在“两天”内，即“先天”和“后天”中形成的。“先天”所包含的遗传和生理结构等方面的因素，至今难以做科学地解释，也可能永远是个谜；所以研究者只能就“后天”来做文章。排除“先天”不论，制约梁启超文化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是特定的社会生态和郁积既久的文化资源。但是，即使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群，由于社会身份尤其是社会角色的不同，文化性格不仅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也就是说，先天的人的自然属性的合理发挥和后天的社会角色的被迫认定，锤炼出千姿百态的文化个性。梁启超出生在耕读结合的农民家庭，虽说没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但衣食无忧的经济

条件和相对有文化的独特优势，颇受他所生活的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村民的推崇，再加上梁启超自幼显现出的机灵和聪明，早早就在十里八乡被挂上了“神童”的桂冠。梁启超自负的优越感和出人头地的争强意识自幼养成。还有家庭对梁启超的厚望以及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追求，给梁以巨大的动力去展现自我。但在当时，提供给梁启超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并不多，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科举。于是他1884年中秀才，5年后又在广东的乡试中名列第八，成举人。正当16岁的梁启超在科举的拼杀中洋洋自得的时候，1890年却结识了康有为。康有为的叛逆性格以及别开生面的学识和政治理念，使梁启超“尽失故垒”。人生的航船出现了重大转折。从此，他跟随康有为，为维新变法竭诚奋斗，终于在1898年促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戊戌变法。这一方面使25岁的梁启超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一方面又在清政府的追捕下变成了“政治犯”，被迫逃亡日本。由此，梁启超基本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他不满现状、立志改革、敢于和当道相对抗的政治性格也基本确立，并大致左右了他人生的后30年。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虽然一时间成了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曾一度成为进步党的核心，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高官，但严酷的现实和他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他那一贯蔑视权贵的政治性格又让他和当权者分道扬镳，最后还是回到书斋做起了学问，直至告别这个世界。梁启超一生无有实权的在野地位，使他能够较为干脆落地摆脱权力的干扰，比较清醒和客观地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这种社会身份的长期积淀，反映在思想文化的选择和定位上，自然是与传统对立的一面多于维护的一面，进取的一面多于守成的一面。

除了社会身份之外，文化人尤其是学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结构对其文化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梁启超可选择的文化资源不可能超越时代，无非是国学和西学。但他是在精通国学的基础上去吸收西学；又在比较全面地考察西学的过程中反过来重新解读中国典籍。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

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sup>①</sup>由于中西相融,所以近代学者常犯的“食洋不化”或“凝古不化”的通病,在梁启超身上较少显现。众所周知,少年梁启超在祖父的精心教导下,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系统的学习,一些古典名著如《史记》、《汉书》等,他能“成诵八九”。结识康有为后,又治今文经学,帮老师撰著《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很有学术深度的专著,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学的学习和运用。这期间的梁启超,也包括康有为,不能说对西学一点儿也不了解,但非常有限,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今文经学为主轴的国学。梁启超真正对西学做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他流亡海外的14年,即25岁到39岁,恰好是他最富创造力的黄金时期。梁启超一到日本,就为其从未见的新知所吸引,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若行阴山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sup>②</sup>在广泛吸收“日式”西学的同时,梁启超还往北美、澳洲等地考察,对西方和日本思想文化的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基本是在康有为的光环照耀下,主要是发挥康有为的思想和学说,那么,客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已经逐步构筑起自己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众多领域形成开风气之先的独立见解,并通过自己富有感染力的论著影响着代中国人。在梁启超新创立的思想文化体系中,虽然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就主要倾向来讲,现代性或曰近代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比起他政治上对中国封建传统网罗的冲击,其文化上的超越传统要晚得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得多。可见,文化性格的转换较政治理想的变革还要难,还要需要时间。五四运动之后的梁启超,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度萧条的影响,开始怀疑西方文化,转而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此后的10年中,他撰写了大量研究先秦到明清的学术文化论著,一时间成为“东方文化派”的领袖人物。从表面上看,梁启超似乎从“西化”回归到了中国本体,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第129页。

② 梁启超:《汗漫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86页。

但从其一系列论著的精神实质、文化内涵、研究方法等去分析,就会发现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做了最实际而很有成效的工作,现代性仍然是其学术思想文化的主体。讲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现代,梁启超晚年的努力最具典型意义。在近代中国,只有像梁启超这样既有厚重的国学根基,又能吃透和灵活运用西方现代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才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由此也大致可以判定梁启超的文化性格是:由传统步入现代,由现代又回思传统;传统中不乏现代,现代中凝聚着传统;在国学与西学的融合和蜕变中创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梁启超的文化意义,恰恰在于他顺应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时代潮流,面向世界,超越传统;他也巧妙地以现代的理念和方法重新阐释中国旧文化,以现代引领传统,改造传统;其文化内核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而魅力四射,永远为后人所关注。

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大致按照保留原貌、有所更新的基本思路,参阅近些年梁启超研究中的一些新资料和新观点,改正了个别错误,增加了一些内容。考察梁启超的家庭和后代,对深入理解其思想和为人很有必要,所以增写了一章。但由于时间紧迫,本想全面改写的某些部分难以如愿,只能在下次修订中去弥补了。

李喜所

2009年元旦于南开大学书来堂

# 目 录

引言——我眼中的梁启超 /1

## 一、寻根 /5

家乡风情 /5

家世沿革 /10

## 二、流水年华 /13

幼年的足印 /13

中秀才——乳臭未干 /16

成举人——翩翩一少年 /18

## 三、康门高足 /22

拜师康“圣人” /22

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 /27

敞开思想的窗扉 /31

## 四、初涉政治舞台 /36

公车上书 /36

组织强学会 /40

《时务报》主笔 /44

执教湖南时务学堂 /47

联志士 建社团 /52

## 五、维新大思路 /59

讲进化 /59



- 开民智 /63
- 变科举 /68
- 兴民权 /72
- 设议院 /77
- 六、站在变法的潮头 /82
- 维新运动的高涨 /82
- 保国会 /87
- 全力推进新政 /90
- 激烈的新旧之争 /94
-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98
- 七、亡命与奋进 /103
- 忍泪逃出国门 /103
- 支持自立军起义 /107
- 办学和办报 /110
- “言论界之骄子” /116
- 漫游新大陆 /122
- 和孙中山的交往 /127
- 八、构筑新文化的新星 /132
- 新星的崛起 /132
- 政治文化 /138
- 经济文化 /143
- 法律文化 /149
- 宗教文化 /155
- 社会文化 /159
- 学术文化 /167
- 九、死战革命党 /181
- 迈向改良的脚步 /181

- 政治革命论 /188
- “开明专制”论 /193
- 反“社会革命”论 /197
- 事与愿违 /201
- 十、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 /205
- 立宪运动的兴起 /205
- 政闻社及其活动 /207
- 宪政运动的灵魂 /215
- 关注财政和外交 /220
- 十一、武昌起义后的抉择 /226
- 新形势 新对策 /226
- 初返国土 /232
- 中国建设问题 /235
- 联袁的前前后后 /240
- 结束流亡生涯 /246
- 十二、与袁世凯握手合作 /250
- 鼓吹“国权主义” /250
- 政团林立中的进步党魁 /255
- 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 /261
- 改革司法 /268
- 币制局总裁的苦衷 /271
- 袖手旁观 /274
- 十三、挥泪反袁 /278
- 猖獗一时的帝制逆流 /278
- 批评与幻想 /282
-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288
- 为何要反袁 /294

- 
- 十四、护国运动的主帅 /299
- 发动起义 /299
  - 潜入广西 /306
  - 促成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 /312
  - 迫袁退位 /317
  - 结束护国战争 /322
  - 痛悼蔡松坡 /329
- 十五、在政潮的漩涡中沉浮 /331
- 研究系的首脑 /331
  - 力主对德宣战 /336
  - 反对张勋复辟 /342
  - 站在康有为的对面 /347
  - 出任段内阁财长 /353
- 十六、漫游欧洲 /361
- 告别官场 /361
  - 详察泰西世界 /364
  - 活跃于巴黎和会 /368
  - 融合中西文明 /372
- 十七、无法改变的参政热情 /379
- 主编《改造》杂志 /379
  - 批评马克思主义思潮 /381
  - 鼓吹国民运动 /388
  - 呼吁“联省自治” /394
  - 调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399
  - 幻想组织第三党 /402
- 十八、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406
- 办学与讲学 /406

---

推进文化交流	/413
著书立说	/419
十九、流传千古的学术成果	/423
治史以求新为本	/423
刻意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学	/443
努力构筑自身的哲学流派	/457
对古圣贤思想的评议	/472
学术史研究中的创见	/487
文化史研究中的建树	/500
在佛学的海洋里寻觅	/510
一批有价值的图书文献学论著	/524
教育学	/531
系统的办报学说	/539
二十、仙逝	/546
二十一、家庭生活和后代风姿	/553
家庭状况	/553
生活扫描	/558
子女教育	/565
后代风姿	/573
原版后记	/582
附录 梁启超生平活动纪年	/584
主要参考文献	/596

# 引 言

## ——我眼中的梁启超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自觉不自觉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令人玩味的是，人类如此众多，却绝难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因而，绝对准确地去描述任何一个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古人，即使所依据的史料百分之百的准确，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价值取向有别，学术水平各异，所写出的人物传记也不可能完整无误，更难使古人呼之欲出，形象逼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了解和认识是相对的，再现历史人物形象则更是有限度的。尤其是那些历史伟人，性格复杂，活动频繁，思想活跃，智慧超群，后人认识起来就更困难一些。本书的传主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谢世，虽只度过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主编《新民丛报》，为一代青年创造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曾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重要职务；五四运动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堪称一代宗师。为如此博学多才又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立传，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本书只能是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绝不敢自诩为准确无误地再现了梁启超。故戏之曰：我眼中的梁启超。

人在谱写自己历史的过程中，受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人文景观所制约，在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就具有决定意义。人物

传记首先应是个性化的历史。梁启超一生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喜欢并善于表现自己，总想在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中国。这种创造型的个性左右了其开拓性的人生。

强烈的欲望是梁启超的人生支柱。他视“希望”为成功之母，总是对他所追求的一切抱定必胜的信念；他把“兴趣”看做事业成败的关键，总是对他所干的一切抱有浓厚的兴趣。受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千方百计在政坛角逐。童年时期，梁启超就有献身祖国的宏图大志，1890年在广州遇康有为后，更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其政治欲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1902年前后，其思想渐渐突破康有为的框架，自成一体，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模式进一步完善。1912年，他结束了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决心在政界一试其锋。此后的8年中，梁启超沉浮于扑朔迷离的政潮而不能自拔。晚年他虽宣布脱离政界，但从未远离政治。“五四”之后的各种政治风云，梁启超总要指手画脚，评论一番。对于一个潜心学术又在政治上屡遭惨败的文人来讲，始终保持这样饱满的政治热情，是难能可贵的。和政治欲相比，梁启超的学问欲更旺盛。其一生几乎天天在做学问，即使涉足政坛的岁月里，也从未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对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一般人少有的兴致，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论著。在那精神亢奋的年月，他一天可以写5000多言，一生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巨著。一部《饮冰室合集》，倾注了梁启超刻苦攻读、勤奋著述的斑斑血泪，也反映了他广博的学术文化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梁做学问，一是求新，从不炒“冷饭”，更反对人云亦云，始终选择中西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拥有众多的读者；二是求通，梁无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议论风生，给人启迪，其是通才，而非专才；三是求多，总以“不知为耻”，只要梁研究的问题一定要

写出论著，其好友曾劝他专精一门或两门，求深不求广，他也知道自己做学问广博有余，专深不足，一度下决心调整战略，但兴趣的广泛，能力的超群，决定了他无法只专一门，而是以多取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梁启超的这种多欲，是和多才、多思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能做出成绩。他天赋好，又勤奋，病危住院，还伏案著《辛稼轩年谱》；他思维敏捷，善于观察社会和探求人生，新思想层出不穷。才、学、识的有机结合，使梁成为著名的思想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是一“情种”。<sup>①</sup>他无论从政、做学问，还是交友、持家，一个“情”字贯彻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其城府欠深，易于激动，知心好友认为他不适合从政，梁开始不服，后来屡屡败北后，也不得不认可。他写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富于“魔力”，透过梁创造的活泼流畅动人的“新民体”，可以感触到其跳动的激情。在爱情生活上，梁也一度为窈窕少女的真情所动，但始终坚持中国式的诚挚而一以贯之的夫妻感情。梁对儿女一往情深，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为人、择业，现存的梁致儿女们的几百封书信，说明他是一位好父亲。尤其是大女儿梁思顺（令娴），梁视为掌上明珠，体现了无价的父爱，真可谓“儿女情长”。

梁启超“流质易变”，总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他也承认，其师康有为“太有成见”，而他则“太无成见”。有些论者将梁一生归之为“十变”，也有的概括为“七变”、“八变”。总之，梁启超的多变是肯定无疑的。需要探讨的是梁为什么如此多变。不少论者从梁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上去找原因，还有的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寻答案。理由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缺少独立意识，其代言人肯定软弱多变；而近代中国又风云突变，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过时了，这一时期是新潮为人们追逐，过不了多久就黯然失色而被抛弃，一浪一浪地迅速推进，使总想站在潮头的梁启超不得不变。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深入一步去看，梁的多变还有深刻

<sup>①</sup> 梁启超自称：“余生平爱恨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91页）

的思想和政治原因,特别是和他追求的改良主义始终不变有因果关系。梁启超一生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之前,先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开明专制,通过开明专制达到君主立宪。在表达这一意愿时,梁有时抨击封建专制,呼喊资产阶级民主;有时又哀叹民智未开,为开明专制评功摆好。似乎他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又是皇权的卫道士。而且,书生搞改良,只能寻靠山。像梁启超这样的文人参政,无非是写文章,造舆论,办学堂,搞学会,组团体,若要真正实现其宏图大志,必须寻求强有力的实力派的支持。梁在戊戌时和光绪等帝党联合,武昌起义后又投靠袁世凯,和袁闹翻后又去寻段祺瑞,待看清段的庐山真面目后,梁再也物色不到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强人”了,于是不得不在故纸堆里寻求解脱。梁这样四处寻靠山,自然就变化不一了。从理论上讲,改良本身就是一矛盾结合体。改良主义者一方面要突破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传统,维护旧政权。在强调破旧的时候,有很大的进取性;在要求保存旧事物、反对革命的时候,又表现出极强的守旧性。所以,只要奉行改良主义,就处于左右摇摆的多变之中。梁一生就置于这种无法自拔的矛盾当中。梁启超改良主义宗旨的始终不变,决定了他实施过程中的多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的所谓“不变”,实际是因为他已不全面坚持他的改良主义目标了,他所梦想的只是拥护光绪帝复辟,延续清朝的统治。至于实现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康有为似乎忘却了。

梁启超的一生是喜剧,还是悲剧?应是喜剧色彩,悲剧性格。他留下那么多的鸿篇巨著,领导过戊戌变法,又是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应该说不虚此生;但他一生所干的事几乎都没有成功,其心境多在愁苦和忧愤之中,晚年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对前途都绝望了。近代中国这个悲剧舞台,决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决定了梁启超的悲剧性格。一位外国学者称梁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此话虽难令人信服,但发人深思。



# 一、寻 根

## 家乡风情

梁启超的家乡坐落在南国水乡——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 100 多公里，多为冲积平原和小山丘，西汉时称四会县，晋更为盆允县，南朝刘宋时置新会郡，隋朝废郡改县，因袭至今，从新会县城往南，过大作家巴金所描绘的“小鸟天堂”，约二三十公里，便是茶坑村。这里正当西江入海之冲，居河海相隔而成的 7 小岛中央，无怪乎梁启超自称为“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sup>①</sup>

茶坑村有 100 多户人家，5000 余人。村前一清澈见底的小河缓缓流过，时有风行的帆船飞驰；村后一布满松柏竹林的小山拔地而起，游人清脆的歌声此伏彼起。山上有一建于明代的凌云塔，雄伟壮观。立于塔旁，珠江三角洲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南海潮的冲天巨浪，隐约可见。可以设想，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常绕塔漫步，思潮起伏，叹人生之艰辛，思祖国之兴衰，念天地之悠悠。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少寒多暑，炎热潮湿，严冬无雪，花开四季，稻花香气逼人，桑园郁郁葱葱，柑橘、香蕉等水果挂满树枝，著名的大葵扇行销全国。但时有台风侵扰，人祸、天灾亦不断袭来，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其县志记云：“新会气候，一岁之间暑热过半，冬无霰雪，草木不

---

<sup>①</sup>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11。